

六十亿人

——人口困境和世界对策

乔治·塔皮诺 等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六十亿人

——人口困境和世界对策

〔法〕乔治·塔皮诺 著
〔美〕菲利斯·皮奥特罗

张开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Tapinos, Phyllis T. Piotrow

Six Billion People

Demographic Dilemmas and World Politic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8

根据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 1978 年版译出

六十亿人

——人口困境和世界对策

〔法〕乔治·塔皮诺

〔美〕菲莉斯·皮奥特罗

著

张开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4,000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198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606 册

书号：4188·30 定价：(六)0.60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编，197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之一，《Six Billion People—Demographic Dilemmas and World Politics》的英文本译出，书中包括四篇论文，对八十年代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人口增长和分布在世界政治、经济上的影响以及可能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并且对现行几种主要的世界人口预测作了估价。

这几篇论文大体上反映了当前西方人口学界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虽然其中有些论点是不正确的，如无视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单纯运用人口现象来解释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等，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分析和判断，但是文章也反映了当前世界人口发展中的一些客观情况，这对于了解当前世界人口问题以及西方人口学研究的动态不无裨益。

这几篇论文所引用的都是七十年代后期的资料，近几年来世界人口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在这几篇论文中也提到了一些初步的迹象。虽然如此，世界人口发展的总形势并没有多大变动，这本书的内容即使在目前也不失其参考价值。

1981年8月30日

目 录

前 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	(1)
人口与世界对策	爱德华·L·莫尔斯 (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世界：人口展望	乔治·塔皮诺 (23)
一、1970—1990 年的人口形势	(23)
二、八十年代的主要问题.....	(6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口政策——面对着人口 激增的洪峰	菲利浦·皮奥特罗 (82)
一、引言	(82)
二、人口政策问题	(96)
三、生育率的趋势与政策	(123)
四、八十年代的人口分布问题	(140)
人口预测：评论和估价	乔治·塔皮诺 (153)
一、人口预测概论	(153)
二、对目前各种预测和假设的评论	(159)
附 录	(181)
作者简历	(225)

前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

关于世界未来人口总数与构成以及人口增长对政府政策中其他问题影响的分析，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一系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研究论文的一部分。每一篇八十年代预测研究的论文都是分析今后一、二十年中可能会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或一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的编写目的不仅在于考察每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且也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八十年代预测丛书收集的研究论文或书籍主要着重于各个问题相互关系的分析，另外一些专门性问题的研究则与更为广泛的预测联系起来而较多地着重于评论。每一组预测研究论文既可以自成体系，又能够与更为广泛的展望相配合一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的编写乃是由于已往三十年中形成国际关系特点的各项假设、政策和机构都已不再能适应今天以及直到1990年及其以后时期的需要了。今后十年中，各种机构和做法都需要进行重大改变以适应1980年及以后时期中形势变化的需要。八十年代预测即在于探索如何确定未来的条件以及可能需要采取的变化方式，但预测的目的既不在于确定单项或单独一组目标，也不是集中在外交政策上也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确定大多数国家共同一致的，可以察觉到的利益，尽管在各国之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

八十年代预测的出版物面向广大读者，包括不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潜在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起着影响作用的人士。因此，不仅要求预测研究论文的作者重视各国读者的兴趣，并且也要充分考虑所论及的一些主要国家国内政治最大可能的现实性。预测丛书的全体工作人员力求不受现状的限制，他们对妨碍必要改革的各种现行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必然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及时改变这些方式或是减轻其后果的方法。

八十年代预测丛书既是对大量紧急的或隐伏着紧急性的国际问题的独立研究，又是包括着美国国内外大量人员在内的共同努力，以便使这些独立的研究互相关联，并且提出可供选择的建议。参加预测丛书的工作人员在三百名以上，有一个核心小班子和一个协调领导小组来确定研究的课题并确定这些课题与政策建议的一致性。先后曾有来自十多个国家将近一百名作者从事独立的研究，有十个工作小组，由专家和知识渊博的多面手组成，他们集体仔细评论预测研究论文的题目并致力于协调各个题目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五十五年历史中一项最大的独立研究项目，在规模上仅有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对战后世界一项比较重要的研究“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可与之相比。在那个时候，世界性冲突所造成的间断性以及对战前国际秩序的许多特点必须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安排和补充的明显而又不可避免的需要推动了这项研究工作。今天世界事务的间断性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即使偶尔发生时，例如取消黄金兑换制和固定货币集团，也只能引起公众短暂的注意。当前已经普遍承认在许多地

区都需要有新的机构和行为方式，但是对这种需要的感觉并不是很迫切的，大部分现有的机构并没有明显失败或已经垮台。因而目前的倾向，并不是对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将要对所有国家提出的要求进行根本的分析，而只是按照已经过时的安排临时凑合应付而已。

八十年代预测丛书的编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认真的努力和各方面的集思广益将能够为九十年代的进步，为建设一个更为人道、和平、富裕和公正的世界有所贡献。希望寄托在参与预测丛书的评论者和读者——不论他们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对当前的各种机会和危险以及未来的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后果提供真知灼见。

八十年代预测丛书感谢福特基金会、利利捐款基金会、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杰曼·马歇尔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上述各基金会都不对八十年代预测丛书中所陈述的事实及观点负责。文责由作者自负。外交关系委员会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全体工作人员极其欣悦地将此书呈献于美国国内外广大读者之前。

爱德华·L·莫尔斯

理查德·H·厄尔曼

人口与世界对策

爱德华·L·莫尔斯

无论怎样排列，在本世纪下余时期内并且直到下一世纪中，抑制世界人口的增长都将是当前国际主要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目前讨论中最典型的论点就是，由于对人类生活的质量以及国际安全保障遭到削弱感到一种新的忧虑，而对传统的国际政策提出了怀疑。人口的增长已经得到一致公认，即世界上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生活之间不可容忍的差距必须加以克服，必须使全世界范围的生活条件更为公平。总之，人口增长问题是造成并且也是说明今日政治具有全球性质的主要原因。

显然，控制世界人口对于取得缓和、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秩序来说，是一个首要条件。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减轻绝对贫困状况的增长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约有十亿人，而且到本世纪结束时，肯定还会有为数更多的人生活在这种贫困之中。营养不良、恶劣的住房、文盲、饮水不足、缺乏卫生设备等等情况提出了如此巨大的挑战，以致降低生育率，尤其是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对所有国家都会是利害攸关的。无情的人口增长——不论繁殖率的下降是多么快——将是造成遍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空前规模失业状况的主要因素，从而也将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并造成影响全球安全的政治革命时机成熟的

环境。此外，除非人口的增长受到抑制，就要设法应付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政治问题，多半会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对人口的迁移采取严格的控制——限制进入城市地区——以作为维持政治秩序和试验经济发展新方式与新策略的手段。人口增长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政治生活和道德风气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正在蓬勃发展的人口问题的国际影响可以用疆界毗邻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些毗邻的疆界使得较贫穷国家的人民得以通过非法移民的办法进入比较富裕的邻国而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子女寻求较佳的境况。甚至即使并不与欠发达国家国境直接相连，发达国家也不能避免这种非法的移民。只要疆界接近得足以使非法移民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在今后二十年中，当政府，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政府试图阻止非法移民时，就会遭遇到极大的政策上进退两难的困境。政府的抉择将包括向邻近的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以保证扩大这些国家的就业机会作为抑制跨国界移民的手段。但是除非工业化国家本国的就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否则这些“输出工作职位”的努力就会非常困难。

由于今后十年之内，各个不同的种族集团将会出现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又由于这些集团往往住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之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地区如非洲更是如此——新的国际安全问题就要作为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增长所助长的种族冲突的结果而出现。这些冲突的起因显然会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一些民族集团排挤另一些与居住在其他几个国家中的人民有种族渊源的民族，如最近非洲之角索马里的例子。但是也会包括国家内部一些传统权力受到挑战的集团与遭到压制的或

者被剥夺权力的少数民族之间，或者与增长率更快的多数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希望保持权力的集团与希望取得权力的集团两方面都会煽动争夺资源与争夺控制政权的种族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就需要地区的或世界性的机构发挥作用，采取措施进行调停斡旋以求和平解决争端。

最后，人口增长将会造成一些可能被认为是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数量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才能应付得了。这些问题之所以被认为是共同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口的增长使得对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而这些资源：粮食、工业发展的原料、资本和技术、能够使出口工业中从业人员得到工作的市场，在国际上常常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激烈争夺；第二，这些问题之所以是共同的，因为它们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不同的国家。城市环境问题——例如住房、交通、卫生——不同于海洋空间上的问题。在海洋上对别国人从事捕鱼、航行和采矿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更确切地说，这些问题之所以是共同的，因为在某些地区试行的办法也可以为其他的民族和政治共同体用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这两种共同的问题都已经出现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的议事日程上了。联合国 1971 年召开了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1974 年召开了关于粮食和人口问题的会议，1976 年召开了关于居住问题的会议。它们加之于现有国际机构的压力很可能达到如此程度，即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机构，而且还可能要求国际机构的全面改组和革新。

总之，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问题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中的其他问题交叉在一起，本书中其他三篇论文即从事

此项预测。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对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有重大的意义。实际上，它们对于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国际事务的基本规则以建立缓和而公正的国际秩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

第一篇论文是巴黎国立人口研究所和政治研究所的乔治·塔皮诺写的，这篇论文描绘了本世纪下余时期内世界人口预期的演变，并概述了对人口政策的一些重要要求：城市化，人口变化的经济费用，种族冲突，国内和国际移民以及国家之间的地区平衡问题。在本书的第二篇论文中，人口危机委员会执行董事，费利斯·T·皮奥特罗分析了过去二十年中生育率政策的成就与争论，到本世纪末生育率将要降低到比较容易控制的水平。然而到了那时，社会控制问题将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作为人口政策的中心问题而出现。在最后一篇论文中，乔治·塔皮诺对目前一些主要的人口预测提出了评论性的考察，并就政府官员对这些预测可能信任的程度作出了估价。

本书的三篇论文表明人口增长在世界事务中无疑将要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当然，几乎没有人怀疑人口因素对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这几篇论文所表明的，这些因素究竟起了哪一种作用，以及世界究竟需要哪一种政策来应付并控制这样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规模，还不是很明确的。

诚然，有一些思想流派主张考虑人口增长的含义。今天人口增长这个名词已经成了一种与假设中的匮乏相关联的马尔萨斯主义通俗说明的中心焦点，在这些宣传者的心目中，人口增长似乎就刻划了明日世界的特点，这个观点与鼓励生育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鼓励生育政策曾经是各国政府追

求的信念，即认为人口的蓬勃增长是国家力量的象征和国际权势的必要条件。正如本书几篇论文曾经作了强有力的论证，十年之后，不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或是达尔文主义的观点都不再能支配有关人口的想法了。代之而起的将是，从与人口有关的状况中派生出来的形形色色互相毫不妥协的新的国内和国际问题。

生育率政策

对待人口状况的态度很难解释为适当的政策反应。对过去的一代人来说，控制生育率曾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捐助者和慈善组织把提高降低出生率的自觉性，尤其是降低发展中国家出生率的自觉性当作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手段，而接受援助的国家却一直令人吃惊地不愿意把降低生育率作为一个优先问题。短期的观点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较之未来一两代以后的人口数量更为近期的事务上。无论如何，控制生育率经常需要政府积极转变在生儿育女问题上的社会和宗教的基本态度，然而这样积极的做法又常常会削弱政府的权威以及政府在许多社会集团心目中的正统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政府所关心的是继续执政，并且建立起国内的政治支持。进行积极努力以抑制生育率所要承担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一种妨碍反对人口增长斗争的观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怎样总是无能为力的想法。正如乔治·塔皮诺在本书第三篇论文中所论证的，人口学理论中对于影响生育率的各项因素的分析是最薄弱的部分。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

声称对生育率水平表示关心的真实含义不过是富国对穷国的干预以外就无所作为，从而更加强了这种消极态度。而发达国家对控制生育率所表现的关心，也确实明显地带有干预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味道。正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所说的，尤其是在1974年联合国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所争辩的那样，控制生育率的焦点可以被看作是富国为了不去解决在欠发达国家看来是经济发展主要条件的借口。这些条件是：增加收入 and 技术的转让，改变国际贸易的规则以便于穷国向富国输出半成品和工业产品。

尽管生育率政策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性，但是却有着越来越多的证明显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向下降。菲利斯·皮奥特罗在她的论文中（见本书第82—152页）用大量材料证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经悄悄地贯彻了与他们在人口问题上经常公开表示的姿态相矛盾的控制生育计划。她也说明全世界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远比以前更为能够接受必需抑制出生率和压缩家庭平均子女数的看法了。不论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是不是因为有了计划生育规划方案的缘故。

没有人怀疑需要继续努力以降低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生育率水平。目前的趋势显示了皮奥特罗博士所说的“生育率的巨大下降”——出生率从大约40%的水平降到35%——然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生率水平相等的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更不必说在绝对数量上还会出现比较不那么难以控制的增长了。即使生育率已经处在能够被控制的过程之中，1990年发展中国家还将有九亿成年人达到生育高峰年龄——15岁到30岁——因而，在本世纪下余时间内，降低生育率的努

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即使是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一代人的需要还不是很清楚的。即使自愿绝育、人工流产以及各种各样老式的和新式的避孕用品广泛流行，而少子女家庭的模式变得更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这些方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需要。因而，即使象菲利斯·皮奥特罗那样的乐观者也倾向于认为，在今后十年中计划生育服务事业在组织机构和分发用品方面都应当有更加大得多的进展，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在自愿服务机构以外，可供选样——或是补充——的方法当然就是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以及印度在七十年代中期所实行的强制方法。但是按照拉丁美洲和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准则看来，强制或是政府的压力不大可能成为可以被接受的计划生育手段。只有在亚洲，政府采取超过自愿以外的办法才是行得通的。但是，正如菲利斯·皮奥特罗所提醒我们的，“就长期而言，在发展中国家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对个人施加压力降低生育率最有效和最可以被接受的方式来自于最直接的源泉，也即来自于社区领袖或甚至是家长，他们对社区和个人的需要较之远在天边的中央政府更能识别，更有发言权。”就短期而言，政府鼓励控制生育率的政策似乎并不是为了人口的理由，而是为了其他的政治目的：改善妇女的地位；更公平地分配收入；义务教育；提高健康水平；老年保险，等等。然而，结果是很清楚的：十年以后降低生育率将会被接受作为国家的目标。

尽管明显的事实是，控制生育率的政策一般总是由国家来实行的，但也有供国际机构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广阔余地。菲利斯·皮奥特罗提出了国际机构在四个方面的作用仍然很重

要，并且有理由在这四个方面推行更为有效与更大得多的计划方案。这四个方案就是：对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扩大计划生育和避孕的服务；研究避孕技术；资助发展中国家对人口因素与发展计划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提高全世界对抑制人口增长以便加强其他经济和社会目标重要性的认识。

很难充分说明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由于受到人口增长的巨大拖累而不得不面对着的巨大压力。1960年世界人口大约为30亿，七十年代中期达到40亿，不论控制生育率政策可能多么有效，1990年将要超过50亿。到下世纪末，世界人口很可能稳定在80亿到140亿之间，这要看生育率的下降有多快和净繁殖率什么时候能够达到1.0的目标而定。这两个估计的差额——60亿人——很大，等于20年以前世界人口的两倍。存在着这一变动幅度的事实就意味着在全球基础上继续抓紧控制生育率的问题是多么紧迫的要求。正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总裁罗伯特·斯·麦克纳马拉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国际机构，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内，必须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努力以贯彻使少子女家庭成为标准化的政策。但是，不论1.0的净繁殖率是在2000年或是2020年或是2030年达到，都不会影响到本世纪必将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

由人口增长所造成的主要问题当然是在人口学的专业范围以外的，它们涉及到社会控制的政治问题，本国经济发展的策略，国际工业政策，国际安全，国际机构的组织与活动。本书的几篇论文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虽然评论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作者们只能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建议。对这些

与人口增长有关的主要问题以及它们在今后二十年中对国际社会的广泛含义作出了一些简短的摘要，也许是有用处的。许多问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测丛书中其他各卷论文研究的重点。

绝对贫困与人的基本需要

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各项问题中最难处理的就是生活在最低水平以下绝对贫困状况中的穷人数量的增长。从现在起到1990年，不论降低出生率的努力多么有效，世界人口将要达到53亿，其中40亿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相当于1976年全世界的总人口。粗略的估计表明大约40%发展中国家的入口——为1970年发展中国家25亿人口中的10亿——生活在玛勃·乌尔·哈克所说的“贫困线”^①以下。这些人的营养、住房和卫生设施、饮水和食品供应、文化教育水平都处于生活最低标准以下。而他们也正是出生率水平最高的那些人。除非从现在起就进行努力来对付绝对贫困的问题，否则，即使在今后十年中经济能够有大幅度的增长，到1990年底，过着非人生活的人口总数完全有可能超过16亿。^②

数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这40%最贫穷的人是最难通过“逐步”的发展过程使他们摆脱困境的。此

① 玛勃·乌尔·哈克：《贫困线：第三世界的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76年。

②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另一篇八十年代预测研究论文：W·霍华德·雷金斯、冈纳·艾德勒-卡尔森的《减少全球的不平等》，外交关系委员会丛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纽约，1978年。